

经济转型的代价

—— 中国城市失业、贫困、
收入差距的经验分析

李 实 主编
〔日〕佐藤 宏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和福特基金会资助
中国公共政策研究项目

经济转型的代价

——中国城市失业、贫困、
收入差距的经验分析

李 实 [日] 佐藤 宏 主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济转型的代价：中国城市失业、贫困、收入差距的经验分析/李实
[日] 佐藤 宏主编；—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5

ISBN 7-5005-7227-1

I. 经… II. ①佐… ②李… III. ①城市-失业-问题-研究-中国-文集 ②城市-贫困-问题-研究-中国-文集 ③城市-居民实际收入-差别-研究-中国-文集 IV. F29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5947 号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www.cfeph.com.cn>

E-mail: cfeph @ dre.gov.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100036

发行处电话：88190406 财经书店电话：64033436

北京财经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787×960 毫米 16 开 26.5 印张 386 000 字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500 定价：53.00 元

ISBN 7-5005-7227-1/F·6322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前 言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是中国经济急剧转型时期。随着中国企业改革的深化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城镇经济进入了艰难时期。部分城镇居民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这包括失业下岗人员的大量出现，城镇贫困人口的增多，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等等。企业的改制和重组是与部分职工的下岗和失业分不开的，这也是解决传统就业体制下长期遗留下来的企业冗员问题所采取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在劳动力市场发育和发展不健全的情况下，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尚在转轨之中，下岗失业所引发的种种问题必然显现出来。它不仅表现为一部分职工丧失工作机会这一简单的问题，还会影响到职工的收入来源及其家庭的收入水平。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部分居民的收入下降可能会引起贫困发生率的上升和收入差距的扩大。这两种结果都会直接地或间接地影响到社会稳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企业职工下岗失业以后，希望能够获得社会保障，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尽快地再就业。然而，再就业机会的多少，失业时间的长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机制和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有效性。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的滞后，下岗失业人员在寻找工作的过程中会处处碰到阻碍——有制度上的限制，也有政策上障碍，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关系）成为人们利用的手段。这一系列的新问题和新现象，都需要从理论上和经验分析上给予有说服力的解释。本书所收录的论文正是对上述几个问题进行了尝试性解释和探讨。

本书的研究成果是集体性的，是中国城镇贫困与失业课题组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他们不仅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用于分析数据和研究问题上，而且千方百计寻找研究经费，保证了住户调查的顺利进行。中国城镇贫困与失业课题也是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和福特基金会资助“中国公共政策研究

项目”的招标课题，该资助为收集数据提供了主要的资金来源，在此表示致谢。同时还要感谢“中国公共政策研究项目”的评委，他们给了我们这次研究机会并对本课题的研究成果给予了积极评价。同时感谢日本大平正芳纪念财团，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补助金和一桥大学经济系现代经济学研究网络项目，日本东亚发展国际研究中心，英国国际开发署等对本研究项目的资助和支持。

本课题至始至终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领导的大力支持，特别是赵人伟研究员、朱玲研究员对课题研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在此表示感谢。书中的部分论文曾在2002年8月召开的牛津大学课题研讨会上进行过讨论。这里对参加研讨会的姚树洁教授、宫晓东博士表示感谢。也对研讨会的组织者奈特教授和安·基普森女士表示感谢。

在收集调查数据中，我们得到了国家统计局城调队住户处的大力支持。尤其应该感谢的是王有捐处长，他不仅很好地组织了住户调查，而且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帮助。数据的清理工作是由张平、魏众负责，他们的认真负责态度保证了数据的可靠性。张凡、谢艳红也参与了数据的清理工作。此外，她们还参与了课题组的许多事务性管理工作，并以工作出色受到了课题组成员的好评。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收录的大部分论文是用英文写成的。谢艳红组织并参与了翻译工作。参加翻译和校对的还有罗楚亮、丁赛。李实对全书的翻译和文字进行了最后修正。

李 实 [日] 佐藤 宏

2004年初春

目 录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城市贫困的理论分析	胡景北(1)
中国城市失业、贫困和收入分配差距 ...	薛进军 魏 众(25)
20 世纪 90 年代末中国城市贫困的恶化	
及其原因	李 实(46)
中国城市中的三种贫困类型	李 实 John Knight (68)
中国裁员的决定因素及后果	
..... Simon Appleton John Knight 宋丽娜 夏青杰	(92)
中国城镇职工失业的持续性与再就业	
职工的收入	John Knight 李 实(119)
失业与再就业的行为变量与意向变量	
关系	佐藤 宏(137)
中国城市失业、消费修匀和预防性储蓄	孟 昕(159)
中国经济改革和城镇收入差距	孟 昕(190)
企业盈亏与职工工资差距	John Knight 李 实(225)
中国城镇职工实物收入下降的原因	
分析	赵耀辉 李 实(250)
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有流动性吗?	
..... John Knight Linda Yueh	(271)
社会资本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	
..... John Knight Linda Yueh	(310)
社会资本投资模型及其在中国城镇妇女劳动力	

- 市场的经验应用 Linda Yueh (347)
- 外出务工、谋职和城市劳动力市场——
- 市场支撑机制的社会网络分析 佐藤 宏(372)
- 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的长期变动趋势 李 实 丁 赛(391)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 城市贫困的理论分析

胡景北

一、导言

城市贫困是 20 世纪 90 年代在中国出现的社会现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独立地发展经济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计划经济制度转型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贫困现象出现得比较晚,但它一出现,就十分迅速地在中国各个城市扩大并加剧。10 年之后,到了 20 世纪初,城市贫困已经成了中国社会的突出现象和严重问题^①。本文拟应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从现代发展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出发,探讨中国城市贫困现象的某些成因。当然,本文的目的不是单单解释中国的特殊现象,而是试图建立某种比较一般的理论框架,说明以中国为代表的一类城市贫困现象。因此,中国只是我们应用特定理论加以解释的一个例子。

与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总体上是一个贫穷国家。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以每日消费不超过 2 美元(年收入不超过 730 美

• 本文是在李实负责的福特基金会研究项目“中国城市的失业和贫困”与上海财经大学研究项目“中国实证经济学的体系和内容”的框架内写成的。初稿曾于 2002 年 4 月在上海财经大学、2002 年 11 月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提交过讨论,笔者感谢讨论参与者提出的批评意见。

① 有关中国城市贫困的统计学研究和案例研究,见关信平,1999。

元)为贫困线、不超过1美元(年收入不超过365美元)为绝对贫困线^①,那么,中国在20世纪末大约一半人口是贫困者,有2亿多人还是绝对贫困者^②。(World Bank, 2001, P.280)同时,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贫困和最贫困人口主要生活在乡村,尤其是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不便的农村地区。这就使得城市贫困对中国全部人口来说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因此,本文所使用的城市贫困概念,指的是广义的一个普通城市劳动者因失业或低工资无法依靠本人劳动能力维持其在城市内基本生活水平的状况,而不考虑其他条件相同时,这个城市贫困者迁移到农村后就不再贫困的情形。城市贫困可能表现为多种现象,具有多种原因^③。如果说发达国家的贫困主要表现在城市里,而且主要表现为贫困者的社会权利被剥夺(deprivation)、贫困者个体由于其贫困而游离于社会生活之外,那么,在发展中国家内,贫困则主要出现在乡村地区,主要表现为整个贫困者团体或阶层在经济上的绝对贫困(Kraemer, 1997)。发展中国家无疑也存在着城市贫困,但比起农村贫困来说,城市贫困的人道主义意义和经济学意义无疑是次要的。这也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贫困研究本身不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④。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农业劳动力和乡村人口逐渐向城市转移,与乡村贫困相比,城市贫困的相对意义也在不断上升,研究城市贫困现象的重要性也在加大^⑤。同时,在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中,城市贫困不是一些家庭或个人在个体意义上的贫困,而是许多家庭或

① 当前世界银行确定日消费金额1美元以下和2美元以下分别为绝对贫困线和一般贫困线时,考虑的是用购买力平价方法折算的1993年美元价格。参见World Bank, 2001, 第319页。

② 根据中国政府的贫困标准,中国贫困人口当时为5000万到6000万。参见World Bank, 2001, 第280页。中国学者的若干估计可见关信平, 1999。

③ 贫困原因有很多种。参见例如Schaeuble 1984。这里,我们排除了因为生理(例如残疾)和心理原因(例如不愿意就业)而成为贫困者的情形,以便把注意力集中在与经济发展和市场机制相关的贫困上,也就是所谓的失业和低工资贫困。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探讨的也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失业的成因。

④ Annis曾经把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贫困受到忽视的原因归纳为5个:1.最贫困的人没有生活在城市;2.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总是偏向城市;3.减少城市贫困的努力只会吸引更多农民进入城市,从而加剧城市贫困(即托达罗悖论);4.减少城市贫困的努力给城市财政带来黑洞;5.找不出任何一般可行的减少贫困的措施。参见Annis, S., 1988, 第134—135页。

⑤ 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发展中国家资料,我们可以一般地认为,随着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提高,城市贫困人口在总贫困人口比重也在提高,甚至比前者提高的更快。参见例如世界银行, 1990。

个人在社会阶层或社会集团意义上的贫困，并且首先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贫困，所以，从经济学上对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贫困加以研究，便有了特殊的重要性。

在理论上研究城市贫困的第一个问题也许应当是它的成因。假如城市人口非常多，城市经济非常落后；或者城市经济虽然发达，但对劳动的需求远远小于城市人口的劳动供给，那么很大一部分城市人口就可能陷入贫困状态。城市贫困的另一个可能原因是城市一部分人不愿意在现行工资水平上就业或不能就业，并因此而贫困。也就是说，在城市概念内部，我们完全可以探索城市贫困的成因^①。不过，本文从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现实出发，把城市贫困视为乡村和城市人口互动、尤其是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过程中的一种现象。也就是说，在本文的分析框架内，城市是整个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城市贫困是城市和经济体系其他部分互相联系的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在这个框架内，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将假定在我们研究的起点上，一个孤立于整个经济体系的城市内部不存在贫困，或者更准确地说，不存在由于失业和低工资造成的贫困。这意味着，仅仅对城市初始人口开放的城市劳动市场是均衡的，均衡工资至少不会使劳动人口陷入贫困状态，因此，城市初始人口在量上是适度的且不再变动的。通过这样的假定，本文将把注意力仅仅集中由整个经济体系的经济发展所可能导致的城市贫困上。

经济发展是一个经济体系从贫困走向富裕的过程。这个体系内部的各个个体在某个时点上的相对贫困或者富裕程度，取决于个体拥有的资源和资源的价格即个人的总收入。社会很大一部分人口拥有的资源是固定数量的简单劳动，他们的收入将由劳动就业和工资决定。由于简单劳动在总量上往往接近和超过需求，在个体供给行为上无弹性，因此简单劳动力的就业风险大、工资低。在发展中国家，很大一部分简单劳动力又构成了剩余劳动力，无法取得就业或者无法取得工资较“高”的就业。贫困和城市贫困问题所针对的主要是这样一部分人口。如果在研究起点上，这些人口在乡村和城市的分布给定，并且前者远远超过后者；如果该体系的剩余劳动

^① 当前对发达国家城市贫困成因的研究，主要从城市本身的角度出发，而且不限于经济学研究，因为那里的贫困可能更是一种社会学现象。有关文献见例如 Mills/Lubuele, 1997。

力主要集中在乡村农业部门，而现代产业集中在城市，那么经济发展过程又将表现为人口或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即城市化的过程。显然，如果人口和劳动力“过快”地从乡村移入城市，城市就可能出现贫困人口，因此城乡的互动可以充当城市贫困的充分条件。

城乡互动是十分复杂的事件。本文仅仅从若干和城市贫困有关的方面去考察它。本文假设城市和乡村的微观经济主体都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如果城市初始人口已知且不变，并满足城市劳动市场的均衡要求，那么城市贫困人口只能来自于乡村进城人口或者因为乡村的竞争而出现的城市失业人口。乡村人口为什么要移入城市、乡村如何和城市竞争，就成了研究城市贫困成因时要考虑的问题。这里要考虑的关键问题似乎又在乡村。对此至少可以举出两个理由：

1. 在我们的分析框架内，乡村人口似乎采取了更为主动的姿态：他们移入城市、他们在乡村和城市竞争。乡村人口都是理性人，他们追求最大效用或者最大收入。我们需要研究的是他们实现最大效用的途径或者条件，研究为什么他们采取移入城市或与城市竞争的方式，从而合理地引出他们的理性行为和城市贫困的联系。

2. 在任何自然地理、技术和人文社会条件下，追求最大效用的理性人总是受到他所生活在其中的经济制度的约束。一个乡村人在考虑自己的移民行为或者和城市的竞争行为时，要注意的不仅是城市经济制度，而且也是乡村经济制度。因此他的最优决策同时受到乡村和城市两地经济制度的影响。城市属于现代部门。在新古典的分析工具里，现代部门的标准制度是个人主义的自由竞争制度，也就是标准的新古典制度或者典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尽管新古典制度会出现扭曲，出现各种程度的不完全竞争甚至根本排除竞争的计划经济制度，但只要理解了标准制度，其变形或扭曲便都能够得到基本的理解。相反，传统或乡村部门属于前资本主义范畴，因此不存在标准制度：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传统部门具有自己的特殊制度。因此，我们在研究乡村人口在城乡互动中的行为时，便需要事先假定一种乡村经济制度，而不能像考察城市那样，直接从新古典标准制度出发。

在前资本主义的乡村农业中，农业土地制度起着基本的作用，决定了乡村经济制度的性质。因此，乡村经济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又可以简缩成农

业土地制度,所以,不同的土地制度可能对乡村人口的最优决策施加不同的约束,从而对农业劳动力的城乡转移、就业和工资发挥不同的影响,并最终导致不同性质的社会贫困包括城市贫困问题。如果这样的话,研究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甚至城市贫困,便有必要先确定这个国家的农业土地制度。乡村部门的土地制度多种多样。地主占有佃农耕种土地的租佃制和小农自有自耕土地的自耕农制便是两种典型的土地制度。本文将以自耕农制度为前提,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城市贫困问题^①。事实上,自耕农制度不但本身就具有理论研究价值,而且也具有经验背景。亚洲和拉丁美洲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农村土地制度便比较接近于自耕农制度^②。本文研究的案例是中国,它的土地制度也可以视为一种准自耕农制度。在中国农村,农民集体占有土地,集体成员个别地使用土地。尽管在中国农村的现实中,现代民主还没有出现,农民集体组织更多代表的也许是政府的利益,但个体农民能够长期使用土地并且获得很大一部分剩余产品,地租范畴基本上没有意义,也许是两个可以暂且认定的事实。由此,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现行土地制度可能更接近于自耕农制度,而较远离租佃制^③ (胡景北,1998)。所以,以自耕农制度作为前提,分析乡村人口的移民行为和竞争行为,对理解具有类似土地制度国家的城市贫困问题可能是有意义

① 发展经济学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和贫困尤其城市贫困问题的研究常常以租佃制为前提。这样说的原因是租佃制能够引出剩余劳动下农业工资不变的结论,许多劳动力转移研究也常常假设农业工资不变,例如 Todaro (1969)、Harris/Todaro (1970) 等对此有著名研究。而在非理论层面上,正如一个尼日利亚的穷人所说:“我们所有问题的根源是没有土地。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土地,我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就能够让我们的家人吃饱、造起房子、让我们孩子得到教育。”转引自 World Bank, 2001, 第 67 页。

② 根据 Otsuka/Chuma/Hayami (1992, Table 1) 整理的资料,1970 年调查的样本国家中,亚洲 (84.0%) 和拉丁美洲 (80.4%) 绝大部分农业用地由其所有者自行耕种,而非洲大部分农业用地既非租佃制亦非自耕农制。虽然 Ray (1998, 第 418 页) 认为他们对自耕农土地面积的估计偏高,但他们的数据至少部分反映了自耕农制度的广泛性。

③ 张曙光 (2002) 认为中国现行土地制度更类似租佃制。他主要从农民在集体组织中失去了某些正当权利的角度论证其观点。

的^①。下面, 本文将在第二部分说明即使在完全竞争的环境下, 只要初始城市人口不向乡村流动, 自耕农制度下农民的理性行为就会导致城市失业和贫困, 因为他们可以用自己的储蓄和投资建立乡村工业, 而乡村工业的低工资成本保证了它在工业品市场上的竞争力, 导致了城市同类产业的萎缩和失业。但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内, 不完全竞争总是表现在城市人口拥有的特权上, 以及城市工资人为地高于农业工资。第三部分解释了城市特权如何使城市劳动力无法在劳动市场上和农民竞争, 因此, 造成了更严重的城市失业和贫困。在第四部分里, 我们指出把城市特权极端化的计划经济制度实际上积聚了城市失业和贫困的巨大潜能。市场化的制度改革让这些潜能猛烈爆发出来, 导致了城市贫困突发性和恶化的快速性。这也是我们在中国观察到的经验事实。根据本文的分析,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城市贫困无法依靠建立或放弃计划经济制度、建立或取消城市特权来消除, 而计划经济或城市特权只会使城市贫困更加严重。只有城乡两地现代产业的共同发展吸纳了剩余劳动力, 同时农业也转变为现代产业, 与经济发展过程相联系的特殊的城市贫困才能彻底消除。

二、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城市贫困

当代发展经济学中的分析模型, 主要是刘易斯经济发展模型^②。如果把它比作微观经济学中的阿罗—迪布鲁 (Arrow - Debreu) 标准模型, 那么, 在完全竞争^③的前提下, 正如阿罗—迪布鲁模型中没有失业和贫困问题一样, 刘易斯模型中也没有特殊的失业和贫困问题。实际上, 无论乡

① 就国别研究而言, Eswaran/Kotwal (1994) 曾经精辟地分析了印度的贫困问题。对他们来说, “在印度, 最贫困的阶级不是有土地的农民, 而是没有土地的农业工人” (第 51 页)。在他们的分析中, 地主的行为起着重要作用。而且, 尽管印度农业基本上已经属于小农经营, 但他们仍然从城乡互动的角度, 强调激进的土地改革措施对缓和当时印度贫困的意义。相比之下, 在本文的分析中既不存在没有土地的农业工人, 也不存在地主。这一点至少部分表明了不同农业土地制度对贫困问题分析的意义。

② 该模型由 Lewis (1954) 提出, 并由 Ranis/Fei (1961), Sen (1966), Harris/Todaro (1970) 等发展。

③ 这里, 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 完全竞争概念更多地强调的是市场参与者, 尤其是城市人口和乡村人口的经济权利平等。例如, 城乡简单劳动者在城市劳动市场上是平等的。

村贫困还是城市贫困都无法出现于完全竞争的刘易斯经济发展模型内。这是因为,只要我们排除康替龙、马尔萨斯设想的过快人口增长和(或)过大人口存量^①,那么,一个具有大量剩余劳动的经济体系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可能实现生存工资。这里,劳动者之间在乡村为取得土地耕作权、在城市为取得就业而展开的竞争,将把他们自己的工资要价压低到生存或者最低水平上。继续压低这个水平,劳动者将因为无法正常生存而退出劳动市场;这又是拥有土地或资本并希望雇佣劳动力的地主和资本家不能够接受的:所以,他们将同意支付生存工资或最低工资。劳动力在乡村和城市之间的流动,将拉平城乡均衡工资^②。按照本文的贫困定义,劳动者能够用自己的工资维持基本需求,保证自己的收入不落在生存收入之下。贫困也许仅仅可能出现在下述两种情况下:第一,短期中,例如价格比工资上升更快的通货膨胀时期,折实的生存工资将低于生存收入;第二,在没有社会保障制度的体系中,人口或者劳动力供给增长过快。此时,为了延长生命,一个劳动者将愿意接受低于生存收入的工资。但是,贫困状态会造成一个人由于健康原因退出劳动市场较早、养育后代的可能性较小、后代数量较少、后代进入劳动市场的概率较低的状况。在这个意义上,李嘉图的工资—人口机制将发生作用并在长期中把人口(劳动力)数量调节到使劳动供给和劳动需求在生存工资上相等的水平。因此,在长期中,刘易斯模型不存在特殊的贫困问题,更不存在特殊的城市贫困问题。

刘易斯模型把土地的地主所有制作为研究前提,用农村剩余劳动对可租地的竞争来实现农业从而整个经济体系的生存工资。假设自耕农土地制度里,每个农民拥有一份自己的土地并耕种之。显然,他的土地产品不再分成地租和工资两类,而都被他视为工资。在这个意义上,农业工资高于生存工资,因为现在的工资包括了地主制度下的地租。这是农业平均收入工资。此时,农业边际收入仍然低于生存工资,所以农业中仍然存在着剩

① Arrow-Debreu 模型实际上也需要这样的条件。Debreu (1958) 在其“价值理论”中把劳动和普通物品一样当成一种由时间和地点标识的商品,并在均衡中获得大于或等于零的价格。但如果某个时点上的劳动过多,他们又不可能(即不愿意)以零或接近于零的供给价格出售,均衡就难以达到。

② 即使城乡之间不实现工资绝对水平相等,贫困尤其是城市贫困也不一定会出现。刘易斯(1954)曾经设想城市生存工资比乡村工资高 30%。如果一个农民因此而进入城市,他或者被雇佣,获得城市生存工资;或者没有被雇佣,被迫退回农村就业,获得农村生存工资。

余劳动。假设一个农民离开乡村到城市生活，他的土地出售收入或出租给他人耕种的地租收入微不足道，那么，这个农民进入城市劳动市场时所要求的最低工资，将不会低于他离开农村后，继续留在农村的农民利用包括了他遗留的土地在内的土地所取得的农业工资。不考虑城乡生活费用的差异，城市产业在扩张时为吸引农村劳动力所支付的工资将不得不相当于农业工资，其水平将和农业工资一样高于生存工资。为此，城市产业必须提高其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所以，城市资本积累将被同时用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就业。在这个过程中，只要城市初始人口还没有充分就业，城市产业便将在扩大生产的时候，首先雇佣城市人口，以避免因为从农村获得劳动力而导致的工资上升。对城市人口而言，他们在劳动市场上的竞争对象不仅是产业资本家，而且也是他们之间不同的个体以及可能进城的农民。因此，城市工资至少不会高于农村工资。所以，在逻辑上，乡村人口进城就业的起点应当是城市初始劳动力供求均衡点。从这一点开始，城市产业的进一步扩张便需要雇佣农村劳动力。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减少，农业劳动生产力提高，农业工资上升，工业工资也将上升，工业劳动生产率亦在提高，农业和现代产业都在发展。显然，在长期经济发展中，自耕农模型也没有失业、低工资和由此而来的贫困问题。就此而言，自耕农模型和刘易斯的租佃制模型一样，也不存在特殊的贫困尤其是城市贫困问题。进一步，自耕农模型还预示了劳动人口的一般贫困可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减轻的趋势。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这里做了一个重要假定，即城市初始人口不向乡村流动。对刘易斯的租佃制模型来说，这个假定很容易放松。例如，我们把研究的起点假设为均衡点。城市初始人口都取得了就业和生存工资。城市企业进一步投资利润到生产中，将需要新的劳动力。乡村剩余劳动力的进城满足了城市企业的需求，同时又保持了原有工资水平。后者意味着城市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不变。这样，如果我们不考虑短期的经济波动，那么在长期中，由于资本不断积累，由于乡村剩余劳动力的长期存在保证了生存工资的长期稳定，劳动力将总是单向地从乡村流入城市，而无需回流，在起点上的城市人口更没有理由流向乡村。另一方面，即使在短期中，一部分城市初始劳动力失业，他们向乡村流动。乡村传统制度将保证人的生存，地主将更多地雇佣包括乡下人口在内的农村劳动者。但只要

乡村原先存在剩余劳动，向乡村流动的城市初始人口便无法改变生存工资的作用。他们的作用，主要只是在农产量提高的前提下导致地租收入有所下降而已。再次，如果在短期中，过多农民进城，他们仍然只能在生存工资上和城市初始人口竞争。若一部分城市初始人口因此失业并流向农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可能仅仅是城、乡两部分人口的相互替换，而不影响刘易斯模型的机制，不导致特殊的贫困问题。所以，城市初始人口不向乡村流动的假定对刘易斯模型没有重要意义。但对自耕农模型来说，这个假定却起着关键的作用。自耕农模型和刘易斯模型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均衡工资决定不依赖于多少具有生物学意义的生存收入，而更多地取决于农业部门的平均收入。平均收入通常高于甚至明显高于生存收入。正是这两种收入的数量差距，增加了模型的复杂性，也提供给我们进一步研究的余地。在自耕农模型里，农业工资高于生存收入，农民就可能储蓄一部分收入。农民储蓄既可能用于农业投资，也可能用于非农产业投资。典型的非农产业是乡村地区的工业。这就是首先被中国学者发现的乡镇企业。它生产的是和城市工业竞争的产品。产品竞争既出现在乡村市场也出现在城市市场上。乡镇企业需要劳动力，并且希望在尽可能低的价格上获得劳动。这些企业的地理位置，使得一个乡村劳动者可以在参加工业生产的同时，继续从事一部分农业劳动。假定他每日（或每年）的劳动时间不变，那么，他从事工业劳动，就必须减少从事农业的劳动。由于自耕农模型同样假定了剩余劳动的存在，因此我们设想，一个农民在一定范围内减少农业劳动，他的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将提高，他的土地产量的下降速度将低于他的农业劳动减少速度。在他决定自己的劳动时间在工业和农业之间配置时，他所要求的工业工资，最低限度是他减少一单位农业劳动所减少的农业收入，也就是农业劳动的边际收入。这样，在剩余劳动和劳动市场竞争的前提下，亦工亦农劳动力的工业工资将等于农业劳动的边际收入，而农业工资仍然等于农业劳动的平均收入。在这种情况下，按小时配置劳动，农民所得的日收入（或者在按日配置劳动时，农民所得的年收入），会等

于或者高于仅仅从事农业时的收入^①。如果农民此时转移到城市，从而完全脱离农业，他所要求的日工资将不低于他在亦工亦农时的日收入。

乡镇工业的出现导致划分劳动力的城乡标准失效。对于贫困问题来说，这里揭示了一个有趣的事实。在乡镇企业发展初期，农民投入乡镇企业的劳动量还不大，农业边际收入还低于农业平均收入，因此乡镇工业的小时工资不但低于农业工资，而且低于亦工亦农者日收入的小时平均数^②。但城市日工资至少不低于农民的日收入，城市产业才能够吸引农业劳动力。所以，城市小时工资将高于乡镇企业的小时工资。因此，在产品相互竞争的城市工业和乡镇工业之间，出现了显著的产品劳动成本差距：假定其他情况相同，城市生产的单位工业产品的价格所包含的劳动成本明显高于乡镇工业生产的产品。由于劳动成本的比重对产品价格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即使城市工业在技术或市场营销上占有一定优势，它也很难和乡镇工业一争高下^③。因此，乡镇工业的产品不但会逐渐占领乡村工业品市场，而且会逐渐占领城市的工业品市场^④。按照赫克歇尔—俄林的贸易理论，产品替代反映的是生产该产品的资源的替代。一般来说，乡镇工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单位劳动所应用的物质资本较少。因此它的产品也是劳动密集型的，它所替代的是城市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所以乡镇工业产品

① 等于还是高于仅仅从事农业时的日收入，将视农民的行为方式而定。如果农民把比如到乡镇企业工作的2个小时看成一个整体，那么，他所要求的2个小时的收入至少不低于他在农业上放弃的2个小时劳动收入。

此时，农民的日收入等于他仅仅从事农业时的水平。如果他分别计算两个小时劳动，他为自己放弃的第2小时农业劳动而向乡镇企业要求的工资便相当于他新放弃的农业收入，而它高于他先前放弃第一个小时农业劳动时向乡镇企业要求的工资。这样，他在乡镇企业的小时平均工资将上升，他的日收入将高于他仅仅从事农业时的日收入。后一种行为是标准的新古典行为。

②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民投入乡镇企业的劳动量逐渐增加，农业边际收入将等于甚至高于农业平均收入。乡镇企业的小时工资将超过农业平均工资。不过，我们在本节暂时不考虑这一可能性。

③ 这里，由于城乡工业产品的价格同一，在市场一般均衡时，城乡的工资差异必须相应地反映为劳动生产率差异上。但对城市工业来说，除了其他问题外，必须面对的问题还有：甲，是否有生产率更高的技术可用；乙，原有劳动力是否具有相应于高生产率技术的人力资本。但即使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城市工业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也会因为不得不实行的技术进步而减少。

④ 乡村工业产品对城市工业产品的替代是中国经济最近二十多年的不争事实。中国民间说法是，凡是农民能够生产的东西，城市企业根本无法竞争。目前需要的是相关的经济计量学研究。